

如何唤醒“沉睡资源”助力村庄发展

——贵州省六盘水舍烹村“三变”案例观察^①

杨慧莲，郑风田，韩旭东，孔玮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当前村庄内部广泛存在的“思想散、资源散、资金散”问题严重阻碍我国村庄发展，甚至有相当一批具有独特人文景观或丰富自然风景的村庄面临躺在资源里却要饿死的尴尬处境。分析当前我国村庄发展的逻辑框架发现：“三散”背景下村庄发展与振兴或可以从庞大的内部“沉睡资源”入手，从“统”的视角寻求突破。获得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与鼓励的舍烹村“三变”发展经验展示了“三散”背景下“统”的发展思路在唤醒农村“沉睡资源”方面的实践科学性。舍烹村案例表明：强有力的带头人、以股权为纽带的利益共享机制、融合的产业体系及包括国家、市场、第三部门等主体在内的宏观条件支持是当前背景下统筹“沉睡资源”助力村庄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条件。

【关键词】：村庄；“沉睡资源”；唤醒；关键要素；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12-140-148

一、引言

农村社区或聚落被称为村庄，它是一种相对于城市社区而存在的特定生活空间。村庄作为中国广阔农村域和历史发展中稳定存在的一种时空坐落，它既传承着千年农耕文明又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有农村人口5.90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2.6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其“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厘清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行政村58.8万个，自然村267万个。村庄作为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空间，其发展不仅决定着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而且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业与农村发展一直属于国家行政“强干预”的核心领域，村庄发展更多依赖国家资源和政策。温铁军等将20世纪80-90年代发展迅速的苏南工业化归因于“村社理性”，认为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内部资源动

¹【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进城农民工同乡同行扎堆创业现象的发生与发展机制研究”（71473256）。

【作者简介】：杨慧莲，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粮食安全、乡村治理等；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相关理论与政策；韩旭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民工创业、乡村治理等；孔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

①作者感谢项目所属机构及人员在数据获取与论文完稿过程中提供的资助与指导。感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处长陈春良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本文作者非常感谢贵州盘县普古娘娘山联村党委陶正学书记、陶永川村支书、杨助理、包括酒店服务员、班车司机、景区环卫工人等在内的村民，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合作社股东及作为舍烹村“三变”7名发起人之一的陶老师和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包括樊经理、敖主管、“三变”街主管李科、黄娅在内的人员向调研小组提供的珍贵资料和热情帮助！

员形成原始资本积累，而且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来内部化负外部性，降低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1][2]}。“苏南模式”提供了村庄发展可以遵循的另一种思路，但是随着农村税费取消与乡村制度改革，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与治理权利被逐步弱化，依靠村社共同体实现村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3]同时，村社共同体的弱化也使得村庄依靠国家资源与政策发展难度增加。从政策实施层面来讲，无论是支农资源发放还是财政资金拨付，一方面以一种近乎平均分配的方式将稀缺资源分配给村民个人的做法很难提高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撒胡椒面”的资源分配方式或许能在短期内改变单个家庭的福利水平，但是对村庄发展助益有限；另一方面国家在一些公共物品投入方面实施“以奖代补”政策^①，由于一些弱化的村社共同体很难组织村民进行前期投入，故基本无缘享受国家相关政策。陈靖研究指出，村治权力与村治资源的结构性限制使得村庄发展越来越呈现两种模式：个体理性主导的分散发展和国家支农资金主导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村庄在第一种模式中近乎“无发展”，第二种模式并未显著改善村庄经济状况与社区福利。^[4]

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等资源性资产66.9亿亩，各类账面资产2.86万亿元，大体上相当于全国平均每个村庄占有500万元^②。为什么拥有如此大额资产存量的村庄不仅发展不起来，而且面临逐渐“空心化”、不断没落消亡的命运？拥有大量“沉睡资源”与村庄没落消亡现象并存并不是当前我国某个村庄独有的特性，而是逐步演变为一种共性的村庄集体式发展困境。本文作者观察发现，近年来陆续涌现出一批村庄成功发展案例，其中贵州六盘水盘县舍烹村不仅在2012-2016年间从一个“偏贫山村”发展成为“最美乡村”，而且其“三变”改革经验得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与鼓励，文件在“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部分指出，“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③。本文选择贵州舍烹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描述展示本文提出的“统”的发展思想在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三散”难题时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总结村庄在唤醒自身“沉睡资源”再造集体资产，调动村庄个体积极性，团结村庄力量重构乡村治理模式方面的关键要素配置及启示。

二、村庄发展：一个逻辑框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2006年税费改革均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举措，前者确定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后者则将广大农民从庞杂的税费压力中抽离出来，取消其向集体组织缴纳税费的义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单个农户家庭可以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该项制度在充分发挥家庭经营优势的同时包含了家庭个体与村集体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连接。^[5]个体与集体之间权利-义务的连接是村庄内部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单个家庭为村集体共同积累做出贡献的同时受集体权利约束，村集体的共同积累为村庄内部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便利。但是，税费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村庄内部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个体农户摆脱税费义务后，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市场经济及城镇化发展大潮的裹挟下按照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寻求自身发展，村庄共同体意识被逐渐弱化甚至瓦解。^[6]当前背景下村庄发展面对“一盘散沙”的局面：农户家庭“各自为阵”高度分散的发展思想；分散在集体与村庄个体手中的耕地、山地、林地等资源；单个家庭内部资金积累与村庄发展脱离关系，国家对农村发展支持从“国家-基层政权-农户”的三级模式演变为“国家-农户”的直接对接模式后，“撒胡椒面”的支农资金分配方式加剧了资金利用的分散化。

[5]

“思想散、资源散、资金散”的“三散”难题并存，使当前村庄发展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困难。传统村庄发展路径对当前背景下村庄振兴的作用有待商榷，一方面依靠国家政策投入的村庄外生发展模式不仅面临“僧多粥少”的现实困难，而且

^①“以奖代补”政策：将专项经费集中起来重点使用，对政府要求的某个项目完成比较好的地区、单位或个体以奖励的方式给予补助的资金分配管理办法，“以奖代补”创新了财政补贴政策的新模式，促进很多准公共领域的良性、持续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扶持资金太过分散出现“撒胡椒面”的问题。

^②国新办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副部长陈晓华答记者问[EB/OL].<http://news.cri.cn/special/gxb20170103001.html>.

^③中央政府门户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

村庄内部个体之间愈加分散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外生资源利用的分散化。稀缺且被极度分散的外生资源很难“集中发力”带动村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效仿“苏南模式”重构“村社理性”内生型村庄发展模式又常常缺乏再造村社共同体的动力和契机。薄弱的村庄集体资金积累、匮乏的资源识别与开发能力、村庄-外部系统间传统单向的“抽水机式”^①交流模式等“没钱、没思想、没人”的村庄现有特征均增加了重构“村社理性”助力村庄发展的难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历史视角来看，“分”的层面已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目前对“统”的层面关注与利用仍然较少。^[6]本文作者认为，当前背景下村庄发展与振兴或可以从庞大的内部“沉睡资源”入手，从“统”的视角寻求突破。陈文胜研究指出，尽管目前村庄内部缺乏发展必须的科技、资金等要素，但是很多资源要素例如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文化资源因未能发挥作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如何将高度集中于工业和城市的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与村庄内部处于闲置状态的稀缺资源进行有效组合是村庄发展的关键。^[7]韩长赋在解读 2017 年年初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累了大量资产，要通过深化改革，盘活集体资产增添发展新活力，并强调如果不盘活整合，大量的集体资产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占的危险。已有研究和《意见》均阐述了对村庄“沉睡资源”“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进一步厘清“谁来统”、“怎样统”等问题，本文从前提、路径、目标三个方面阐述当前背景下村庄发展可能的逻辑框架。

确定了村庄发展“统”的总体思路之后首先需要明确“谁来统”的问题。田毅鹏在已有研究中分析村庄原子化形成过程时提到，伴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建立，村庄共同体和共同利益往往遭到破坏，村民成了孤单的个体，村庄内部与村民之间的集体意识逐步减退、协作能力下降。^[9]《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民卷）》数据资料显示，全国农村常住劳动力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 88.9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常住劳动力仅占 11.04%。如上两点说明依靠村庄内部个体力量实现集体觉悟并组织村庄发展如同“缘木求鱼”。这种情景下，村庄落实“统”的发展思想前提是产生一个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具备一定资本积累、拥有强大社会网络与良好信任基础的带头人带领村庄发展。大量已有研究指出社区精英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村庄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精英个体支持。其次需要明确“怎样统”的问题，陈靖在论述村庄发展内涵时指出，任何一个村庄发展都离不开产业推动地方整体性变迁和村庄自组织的深度参与。^[4]村庄发展必然是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力”的过程，带头人为构建村庄共同体提供了契机。按照舒尔茨理性小农假说，尽管具备前述特质的带头人相对更容易建立起村庄内部个体之间初期的发展联结，但是这种联结的可持续必然要追溯到利益联结本质。村庄内部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既不可能饿着肚子跟带头人干，也绝不会无视统筹发展带来的收益增加^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后即需要思考实现村庄“物尽其用，人尽其力”的组织方式与制度设计。已有研究指出，合作社等组织在统一发展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其贡献包括壮大个体组织参与市场的力量，例如依靠合作组织实现与外来资本对接，易形成势力均衡的谈判格局。^[9]另外，似乎没有比现实的经济利益更能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手段了，如何让参与者分享到更多村庄发展果实是执行“统”的村庄发展思想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具体来讲，当前背景下村庄发展可以依赖的路径必然包含借助合作社等组织通过设计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整合村庄“沉睡资源”以支撑村庄发展的逻辑内核。明确村庄“谁来统”和“怎样统”问题之后，尚需要明确村庄发展的目标。村庄-外部系统间传统单向的“抽水机式”交流模式长期存在，缘因村庄和外部资源系统交流本身存在不平等性。虽然村庄向外部系统输出劳动力和初级农产品，但村庄因其“脏、乱、差”的恶劣条件，不具备吸引外部资源进入的条件。“抽水机式”交流现状让农村发展更加被动，资源剥夺更加严重。想要改变“抽水机”式的交流模式，需要村庄具备与外部资源系统平等交流的条件，即不仅需要村庄建立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守”的产业体系，而且能创造吸引外部资源进入的产业条件，村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城乡产业对接的基础上。^[7]综合来讲，村庄发展应以突破传统产业、实现三产融合、拓展社会功能为产业建设目标。当村庄提供给外部资源系统更多优质产品与服务、承担越多的社会功能时，与外部系统的密切互动将为其持续发展带来强大动能。

本文村庄发展的逻辑框架是基于当前背景下村庄“思想散、资源散、资金散”的“三散”难题与村庄内部存在大量“沉睡资源”的现实，从“统”的发展视角构建的，其实践价值仍然需要科学严谨的论证。本文作者观察到，贵州省六盘水盘县舍烹

^①“抽水机式”交流模式是一种传统的村庄与外部经济系统的交流方式，表现为村庄内部向外部系统大量输送农产品、劳动力等资源，仅获取极少的经济回报。

^②舒尔茨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因而传统农业的改造完全可以寄希望于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

村不仅在 5 年内从一个藏在贵州深山中的“偏贫山村”发展为“最美乡村”，而且其发展经验得到中央的关注与肯定。为此，特成立调研小组于 2017 年 1-2 月赴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舍烹村蹲点调研，通过对舍烹村发展观察感知及与盘县普古娘娘山联村党委书记、舍烹村支书（银湖合作社社长）、酒店服务员、合作社班车司机、景区环卫工人等在内的舍烹村“三变”发起人、合作社股东、旅游公司管理人员、舍烹村村民等人员的多次访谈，收集到本文研究需要的一手资料。本文作者将尝试通过剖析舍烹村发展案例来论证当前背景下以“统”的发展思想唤醒“沉睡资源”助力村庄发展的实践可行性与科学性。^[10]

三、舍烹村：典型案例观察

（一）舍烹村基本情况介绍

贵州六盘水舍烹村位于普古乡东部，距普古乡政府所在地 21 公里，东靠普古乡厂上村、噶木村，南连普古乡卧落村、天桥村，西接普古乡新寨村。全村地貌山高谷深，西高东低，全年平均温度为 18-19℃，无霜期长。村域总面积 6.1 平方公里，包含 8 个村民小组，6 个自然村寨，全村共有 1326 亩耕地，其中 897.3 亩水田，山地和林地面积共计 3970 亩，森林覆盖率达 28.98%，土地类型主要为山地和坡地，全村海拔介于 1300-2319 米之间，属立体气候，生物多样性突出，主要分布民族有苗族（47.31%）、布依族（36.63%）、彝族（15.61%）和汉族（2.44%）。过去的舍烹村是贵州深山坳里的一个贫穷没落的小山村，基础设施极其落后，村里只有一条狭窄泥泞的小路，“出门靠爬，回家过趟”是对过去舍烹村生活的真实写照。2012 年舍烹村共有 410 户村民，其中贫困户 254 户，涉及贫困人口 414 人，村集体资产为 0，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为种植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全村人均年收入约 700 元，为维持生计，全村 80%的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舍烹村成为典型的“空壳村”。但是 2016 年时舍烹村共有 486 户村民，其中贫困户只有 52 户，涉及贫困人口 102 人（缺乏劳动能力，社会兜底部分），人均年收入 12800 元，集体资产包括 60 万现金和部分股权，全村几乎无外出打工者，已外出定居者出现举家回迁现象，村内劳动力实现 100%就业，上班有班车按时接送，统一吃饭，统一工作服，且此时以舍烹村为核心的娘娘山生态农业旅游景区已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2 年与 2016 年舍烹村基本情况详细对照及变化说明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2012 年与 2016 年舍烹村基本情况对照表

	2012 年		2016 年		变化说明
	人/户	人/户	人/户	人/户	
全村人口	1303	410	1413	486	增加 (回迁现象多见)
贫困人口	414	254	102	52	显著减少
人均年收入	700		12800		显著增加
收入来源	玉米/水稻种植+外出务工		工资收入+土地固定分红+股权分红等		多样化
外出劳动力占比	80%		0		显著减少
基础设施	1.6 公里*4.5 米硬化公路； 48 盏路灯		14 公里*6.5 米硬化公路； 500 多盏太阳能路灯； 8 个停车场；各类标准宾馆、 饭店等设施		显著改善
资源禀赋	1326 亩耕地，897.3 亩水田， 3970 亩山地和林地；多民族聚居		1326 亩耕地，897.3 亩水田， 3970 亩山地和林地；多民族聚居		不变
产业类型	传统种植业（玉米/水稻等）		山地特色农业+乡村旅游		产业融合
集体资产	0		60 万资金+部分股权		显著增加
标签	无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新增

		“三变”改革发源地	
农民组织 (能动作用)	无	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等	新增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贵州六盘水市盘县舍烹村蹲点调研资料整理获得。

(二) 舍烹村发展阶段描述

根据课题组蹲点调研资料，将舍烹村发展大致归纳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村庄与个人发展困境诊断。2012年以前舍烹村发展的困境可以从表1中窥见，全村410户村民中有254户为贫困户，全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1.77%；村庄土地类型以山地和坡地为主，种植玉米、水稻等传统农作物不仅不能提高收入，而且面对产量锐减的现实；尽管为维持生计，全村80%的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但是全村人均年收入仍然仅为700元；村庄基础设施落后，生活条件恶劣。陶正学是从舍烹村走出去的农民企业家，经历了商海沉浮之后，2010年他依靠经营煤炭产业积累约5亿资金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2011年，陶正学经营的煤炭行业市场开始不景气，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困难。

第二阶段：资源与资金统筹整合。2012年陶正学基于为员工谋发展、家乡情怀和追求人生意义三个方面的考虑，决定带着追随他的员工和巨额资金回到家乡投身农村，带领舍烹村村民共谋发展。为统一发展思想，陶正学一方面多次组织并召开群众大会，帮助村民分析发展效益；另一方面个人出资60多万带领一支由舍烹村村干部、村民代表和乡分管农业的责任人组成的多人考察团赴云南等地取经以开阔发展思路。为整合分散的资源与资金，陶正学在投入大量自有资金进行村庄基础设施改造的同时，发动包括其在内的7名舍烹村村民率先成立了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然后鼓励舍烹及周边村（联村）村民以土地或资金形式入股合作社。入股方式为：如果村民以土地入股，那么每亩地每年除享有300-800元（按照土地质量确定，一般为500元）不等的固定分红外，待土地获得收益后还将按照股份确定分红；如果村民以资金入股合作社，20万元合为1股（为减小入股村民资金压力，陶正学主动提出舍烹及周边村农户可以先拿出10万元，自己以自有资金配套垫付10万元，如果亏损算陶正学的，盈利后农户按1股分红；如果村民实在拿不出资金，但又想入股合作社，那么既可以找陶正学借钱入股也可以寻找数量不等的间接股东筹集资金）。截止2016年，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先后流转土地2.18万亩，募集资金共计2000万，其中包括联村村民名义出资1460万（实际撬动农户资金730万，其他由陶正学按照“出资多少配套多少”的标准先以自有资金垫付）和陶正学个人出资540万。按照入股资金分配股权，联村村民持合作社73%的股份，陶正学持合作社27%的股份，合作社共拥有直接股东465名。

第三阶段：“一体两翼”的产业体系构建。通过合作社组织以入股的方式整合了村庄内部个体分散持有的资源要素后，陶正学和其他管理者一方面将发展山地特色农业作为舍烹村产业建设目标，另一方面聘请专家团队考察舍烹及联村山地、林地、多民族资源禀赋，于2013年注册成立“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公司”，搭建起以合作社和旅游公司为组织核心的山地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一体两翼”产业体系。需要强调，舍烹村在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不仅组合利用了村庄内部个体农户所有的土地、资金等要素，还将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以集体股权的形式整合融入产业开发，例如舍烹村银湖水域以集体产权方式入股娘娘山生态农业旅游公司，旅游公司每年要将水面开发纯收益的10%交给村集体。此外，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等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股金后集中投入支持产业建设。舍烹村产业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舍烹及联村资源禀赋与村民（人力资源）是产业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合作社与旅游公司之间存在多种形式的互动联结。具体来讲，联村村民以自有耕地资源入股后，合作社将原本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资源整合、规划，摒弃传统的玉米/水稻等农产品种植而主要栽植符合山地特色的农产品。目前合作社已经规划并栽植包括刺梨、猕猴桃、蓝莓、石榴、山核桃、车厘子、杨梅、樱桃、桑葚在内9个品种的高价值精品水果，截止2016年，合作社完成刺梨种植8200亩、猕猴桃4080亩、蓝莓1050亩，其它精品水果共2700多亩。旅游公司建立之初，合作社将筹集的2000万股金入股旅游公

司，最终旅游公司总股本增至1亿，合作社持有旅游公司20%的股份，旅游公司盈利后需按照20%的股份份额分红给合作社。旅游公司主要负责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合作社整合联村农户耕地资源后，按照科学规划连片种植的精品水果基地作为山地精品水果生产基地的同时构成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内容。生态旅游开发以联村自然资源禀赋为条件，发展初期陶正学首先动员舍烹村集体将3817亩山/林地、300亩河流等自然资源量化入股到旅游公司以供开发设计，其次邀请专家考察娘娘山旅游资源并于2013年初发现海拔2319米处有一片40200亩湿地资源（华南最大的高原湿地），勘探出较适合温泉钻井的地方4处。旅游公司从游览观光、湿地体验、科普考察三个角度保护性开发高原湿地资源，并依据温泉资源优势开发出别具特色的温泉小别墅。文化体验则主要基于联村村民的多民族（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特色打造，具体做法是还原民族文化活动（彝族古歌、彝族酒令舞、彝族搭体舞、苗族芦笙舞、苗族大筒箫、布依盘歌、火把节等），保留具有民族特色的房屋建筑等。科技大棚包括智能温室大棚2个（5052平方米），连体大棚10个（31000平方米）。智能温室大棚内部展示包括恒温系统、无土栽培技术、节水灌溉和娘娘山湿地公园景区沙盘缩影等。连体大棚内种植包括火龙果、葡萄、草莓、人参果等在内的高价值精品水果，以满足游客观赏采摘需要。栽植秋葵、茄子、西红柿、黄瓜等时令蔬菜，主要满足景区酒店、农家乐和附近农户的蔬菜需求。2016年，科技大棚实现门票年收入45万元、采摘收入11万元、生产大棚年收益200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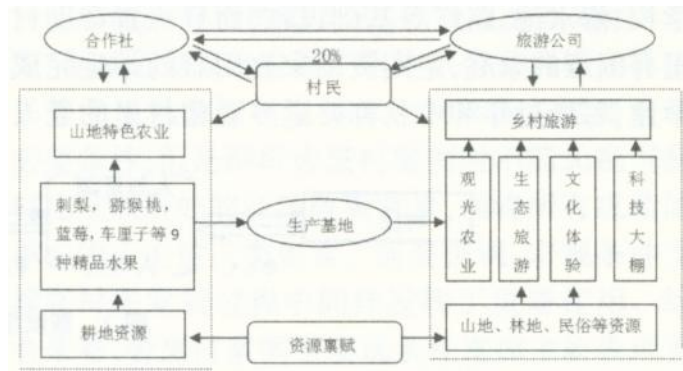


图1 舍烹村产业体系框架

单独依靠舍烹村已有资源带动村庄发展存在空间局限性，为更好地整合发展资源，2013年7月，以舍烹为核心，新寨、天桥、播秋、嘎木、卧落、厂上、水坝7个村党支部与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联合成立普古乡娘娘山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党委（联村党委），陶正学被推选为联村党委书记。联村党委的成立使得舍烹村实现了地理上的“超级村庄”。截止2016年，普古乡娘娘山生态农业示范园包含的8个核心村实现了村村有产业，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平均达22万元，其中2220户5455人变成了股东，入股农户年均增收6000元，2016年实现分红63万元[®]。

四、案例分析与讨论

舍烹村发展案例展示了当前背景下以“统”的发展思路唤醒自身“沉睡资源”助力村庄发展方面的实践科学性及启示，带头人、以股权为纽带的利益共享机制、融合的产业体系及宏观条件支持对当前背景下村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头人

盘县普古乡舍烹村一直流传一句顺口溜“头顶娘娘山，脚踏六车河，谁人识得破，银子用马驮”，直到2012年以前都没有人能识得破藏在贵州深山里的舍烹村。陶正学是从舍烹村走出去的乡村精英，舍烹村的发展以2012年陶正学带着大额资金返乡带领村民发展为开端。作为村庄发展带头人，外面的闯荡经历锤炼陶正学经营管理能力，帮助他积累大额财富的同时也让他比久居村庄的村民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作为舍烹村村民，返乡之前陶正学不仅以个人名义陆续出资1100万为家乡修路、修学校、修水池、路灯等基础设施，而且一直帮助村里有困难的家庭，定期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每逢过

年和中秋都要返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并提供一些生活费和生活必需品。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为陶正学识别舍烹村发展潜力与机会提供了可能；在村庄内部长期建立的良好信任基础消减了村庄发展初期面对信任障碍，降低了资源统筹过程中动员与组织的难度；自有的 5 亿资本积累构成了舍烹村发展初期重要的资金来源，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村庄发展初期的资金障碍，重塑村庄发展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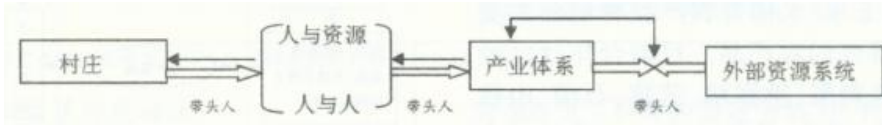


图 2 禀赋型村庄带头人作用

图 2 描述了带头人在统筹村庄发展中的作用，首先，带头人以其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识别到禀赋型村庄发展的潜力与机会；其次，带头人在市场锤炼中获得的经营管理与组织协调能力配合其在村庄内部奠定的良好信任基础，能最小化村庄内部人与人、人与资源之间的协调成本，相比外部介入者，更易团结村庄内部发展力量；最后，带头人强大的社会网络优势配合其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帮助村庄更快更准地与外部系统对接，有效减小村庄与外部系统在空间上的区隔。^[11]打通内外部系统能量交换渠道，不仅能够帮助村庄节省利用外部资源的成本，而且可以有效减少外部资源系统在目标搜寻中产生的资源耗散，有助于改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12]肯定带头人在村庄发展过程中“领头羊”与“粘连剂”的作用，但不能将村庄发展盲目夸大个人作用，要深刻理解任何村庄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力”的过程。

（二）“三变”：股权为纽带的利益共享机制

除带头人作用外，舍烹村将统筹各项“沉睡资源”以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力”的组织与制度创新简练地归纳为“三变”，具体包含“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其中“资源变资产”指村集体将集体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资源要素，通过入股等方式盘活，让过去的“死”资源变成“活”资产；“资金变股金”指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等，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股金后集中投入到各类经营主体，村集体和农户按持股份额享受股份权利与分红；“农民变股东”，指农民自愿将个人的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入股到经营主体，成为股东参与分红。^[13]“三变”制度创新的实质是在村庄内部建立以股权为纽带的利益共享机制。2014 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时即强调“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目标方向，是要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14]“三变”制度设计检验了中央农村改革方向的科学性与前瞻性。“资源变资产”不仅将村庄自有资源整合转化为发展资本，而且增加了村集体积累；“资金变股金”不仅有效整合了国家投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在刀刃上，而且以村级组织为主体的集中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增加村庄内部长期收益；“农民变股东”为舍烹村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能，不仅将村庄内部成员剩余资金转化为发展资本，而且调动了农户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股权激励的方式将村庄内部个体由空间秩序的消极参与者演变为空间秩序的积极塑造与维护者。舍烹村案例中农户多以耕地和资金资源入股合作社，耕地入股合作社后，每年每亩耕地可以享有 300-800 元不等的固定分红，待耕地种植的经济作物获得收益后（游客采摘与采购精品水果产生的收益归合作社所有，合作社向旅游公司收取每亩 20 元管理费，从每斤农产品中抽出 5 分钱作为村集体积累）还可以按照耕地入股股份获得分红；资金入股合作社后年底按照股份获得合作社分红。以自有耕地和资金入股合作社，摆脱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户可以从合作社、旅游公司等村建项目获得一份每月约 2000 元工资的工作（目前合作社和旅游公司共有约 180 个岗位可供村民就业）。合作社负责为工人（农户）提供统一工作服，建有职工食堂，每天提供免费早、中、晚餐并安排班车按时接送上下班。舍烹村“三变”制度设计，成功将村庄各项资源与国家资源统筹纳入村庄发展，让全体村民分享村庄发展成果，通过制度化路径消减了发展成本。

（三）融合的产业体系

2012年以前的舍烹村发展单纯依靠第一产业支持，80%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本身即是内外部系统交流不平等本质的想象映射，社会经济系统对村庄系统长期“抽水机式”的资源剥夺只会将村庄进一步推入无底深渊，彻底斩断其发展念想。想要改变村庄与外部资源系统“抽水机”式的交流模式，建立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守”的产业体系与创造吸引外部资源进入的产业条件缺一不可，城乡产业对接是村庄发展的必要条件。^[5]舍烹村经历了由传统种植业（玉米/水稻等）向山地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的产业转型融合过程（表1），山地特色农业是传统农业向经济社会的延伸，村庄在把握自身农业生产禀赋特征的基础上，依据市场需求生产与市场需求相对接的农产品。以刺梨为例，舍烹村种植的刺梨不仅可以满足游客采摘、采购消费需求，而且刺梨产业与贵州天刺力公司对接，以“天刺力”为品牌开发刺梨系列产品。从市场调研了解到，目前罐装的单瓶天刺力刺梨果汁售价6.5元，50克的天刺力刺梨果脯售价为9元，50克×12盒的刺梨果脯售价为108元。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的对接有效提升了初级农产品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吸引其“留守”村庄，而且作为矫正内外部系统间失衡交流状态的重要方式存在。乡村旅游在统筹整合村庄资源后提供给消费者更多优质的服务产品，村庄在满足消费者休闲、观光、体验等多种需求的同时获得可观经济回报。2016年舍烹村累计接待游客32万人次，按人均消费100元计算，旅游综合收入（含带动区域经济收入）达3200万元。融合的产业体系在吸引大量外部资源进入村庄消费的同时，又为外部资源进入村庄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舍烹村通过融合的产业体系建立起内外部系统之间良性的循环机制，村庄在拓展社会功能的同时获得丰富的社会回报。调研了解到舍烹村未来发展规划包含拓展并丰富大健康产业服务功能，可以预期村庄将在提供给外部资源系统更多优质产品与服务、承担更多社会功能的同时获得强大的发展能量，支持其向着超级村庄目标跨越发展。

（四）宏观条件支持

虽然强有力的带头人、以股权为纽带的“三变”制度创新及融合的产业体系带来的城乡经济平等交流是舍烹村取得惊人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条件，但是剖析舍烹村案例时不能无视当前村庄发展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而将所有成绩单归因于上述三类要素。需要强调，宏观条件支撑在村庄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来看，舍烹村案例中宏观条件支撑主要表现为国家、市场、第三部门等主体的支持。

国家对村庄发展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策、资金方面。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针对农村发展的政策，“新农村建设”及各项产业激励政策的出台都意图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4]舍烹村案例中各级政府负责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投入；村级发展资金、专项扶贫资金、小康驻村帮扶资金等项目资金丰富了村庄发展资金；农惠农等政策拓宽了村庄发展融资渠道。市场对村庄发展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强劲的消费需求和外来资金投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2012年增加7311元，年均实际增长7.4%。2017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3%，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超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9个百分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17年上半年旅游统计数据报告》，2017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25.37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3.5%。其中，城镇居民17.57亿人次，增长15.8%；农村居民7.80亿人次，增长8.5%。国内旅游收入2.17万亿元，增长15.8%。其中城镇居民花费1.71万亿元，增长16.1%；农村居民花费0.46万亿元，增长14.8%。庞大的市场和强劲的旅游消费需求为舍烹村发展带来机遇。外来资金投入也为舍烹村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舍烹村温泉别墅、“三变”街等耗资巨大的项目均由村庄和外来资金合作共同开发，建立有效联结机制后活跃的资本市场将为村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第三部门主体对村庄发展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技术、智力等方面。舍烹村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组织村民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还出资聘请外部专家定期提供多种类型的指导与咨询，为发展需要还陆续与贵州大学、贵州省农科院、六盘水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山东寿光集团有限公司等组织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外部宏观条件构成了村庄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方劲在研究乡村发展内源性能力建设时提到，即便村庄内部民众有了一定的自主发展能力，但是如果缺少相应的外部宏观条件作为支持和保障，其发展的程度和效果亦是有限的。

五、结论与启示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现实的困难更容易唤起思考、推动改革。舍烹村发展经验提供了当前背

景下村庄以“统”的发展思路唤醒“沉睡资源”、助力发展的诸多启示，强有力的带头人、以股权为纽带的“三变”制度创新、融合的产业体系及包括国家、市场、第三部门等主体在内的宏观条件支持是唤醒“沉睡资源”、助力村庄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条件。带头人以其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识别村庄发展机会，把握村庄发展方向，协调并支持村庄内部抱团发展；以股权为纽带的利益共享制度设计不仅可以将村庄分散的资源转化为村庄发展动力来源、集国家政策资金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而且能有效激励村庄个体深度参与村庄发展，将村庄发展变成“人人有责，人人有利”的事业，改变传统村庄个体对村庄发展的漠视甚至破坏状态，将其演变为村庄发展的贡献者和守护者；融合的产业体系在与国家、市场、第三部门主体等外部社会资源系统形成同构、密切互动的交流过程中为村庄发展提供持续发展的经济动能。

从舍烹村发展案例获得关于村庄发展的两点启示：首先，任何村庄发展都不能脱离村庄禀赋、割裂村庄主体、枉顾宏观条件，应该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统筹挖掘现有资源，因地制宜提出发展规划、激励村庄主体深度参与、同构外部资源系统。其次，带头人是村庄发展时序层面最关键的要素，村庄的发展需要挖掘并培养具有潜力的带头人，为带头人的产生提供政治、经济、社会土壤。借用访谈时陶正学书记谈村庄发展的一段话“一个村庄的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好的带头人识别村庄发展机会，动员协调村庄内部主体共同参与；发展过程中带头人和村庄组织需要共同思考并解决好发展资源/资金从哪里来，赚到钱怎么分等问题；村庄发展要做到‘两个不能’、‘一个必须’，既不能怀着等靠要的心态搞发展，也不能偏离国家政策盲目发展，必须超越传统功能看待当前村庄发展。”

[参考文献]:

[1]温铁军,等.解读苏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20-27.

[2]温铁军,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4):20-23.

[3]杨华,王会.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1-49.

[4]陈靖.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1-39.

[5]赵晓峰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J].学习与实践,2011(11):71-80.

[6]马超峰,薛美琴.村集体经济再认识与集体经济再造——来自浙江省126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的调查[J].经济与管理,2015(1):90-94.

[7]陈文胜.论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发展[J].中国农村观察,2014(3):52-56.

[8]田毅鹏.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以社会原子化为分析视角[J].探索与争鸣,2012(12):65-69.

[9]赵祥云,赵晓峰.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7-22.

[10]余航,郑风田.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北京市何各庄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1(4):86-91.

[11]郭斌.农村社会网络嵌入与农业企业层级控制结构——以某省J农业有限公司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2(6):22-30+89+93.

[12] Janet Currie and Firouz Gahvari, Transfers in Cash and In-Kind: Theory Meets the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 2, 333-383.

[13] 罗凌, 崔云霞. 再造与重构: 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 (12): 153-157.

[14] 新华网. 习近平: 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督察关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82820.htm.

[15] 方劲. 乡村发展干预中的内源性能力建设——一项西南贫困村庄的行动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 (4): 31-41+95.